

中华百家人生智慧丛书

功利与权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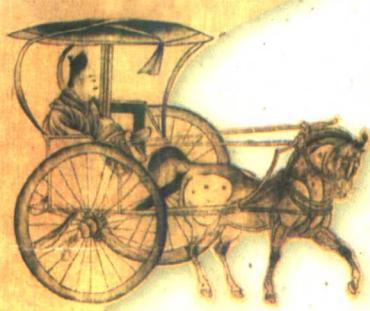
我们一般人常常把善与恶、
是与非作正确与否的标尺。
纵横家们不同，
他们生活的目的性很强，
功利性很强，
往往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纵横家的人生

武汉出版社

郭齐勇 / 主编
吉桂丽 / 著



中华百家人生态智慧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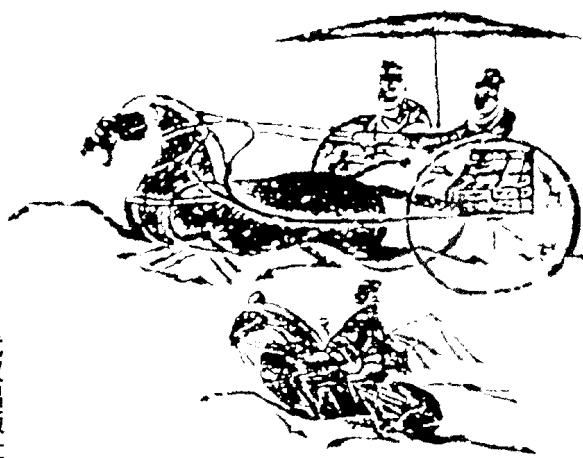
郭齐勇

主编

唐桂丽 著

功利与权谋

纵横家的人生智慧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利与权谋：纵横家的人生智慧/唐桂丽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5
(中华百家人生智慧丛书/郭齐勇主编)

ISBN 7-5430-1757-1

I . 功… II . 唐… III . 纵横家 - 哲学 - 通俗读物 IV . B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426 号

功利与权谋——纵横家的人生智慧

唐桂丽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13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9.00 元

ISBN7-5430-1757-1/B·39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序

郭齐勇

—

我们这一套丛书，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出发，通过中西对比和古今融通，发掘先秦诸子百家和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的人文睿智，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资源，为当代人精神上的安立起一点点辅助或调剂的作用。因而，作者们力图以平易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文风，可读性强的随笔方式，再现古代哲人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以便利各位读者朋友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消遣品味，并为您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管理的谋略、辩说的技巧、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贡献一点一滴的雨露甘泉。

我们处在电脑网络进入百姓之家，太空飞船遨游星际之间的时代，科技进步，商业繁荣，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真

2 /功利与权谋——纵横家的人生智慧

正是所谓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就知识的层面而言，轴心时代的孔子、老子、墨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东方西方一切远古的先知、圣贤，没有哪一位可以与今天的小学生相媲美。但是，我们要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知识不等于智慧，科技代替不了人的终极的关怀和生命意义的体悟。就人生的大智大慧、境界的追求的层面而言，拥有电脑的现代人，却不敢斗胆地断言他们比古代的智者或圣贤更聪明，更高远，更完美，更有灵性。无论中国外国，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是可以不到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去寻找精神资粮的。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根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人类文化源头的乳汁仍然可以滋养现代心灵。这也是我们咀嚼、反哺古代人文精神智慧的缘由。

二

通过对中国文化基因和古代人生智慧的源头活水之解读、反哺，我们可以进而思考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

一说起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人们自然会想到欧洲 14 -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在神性对人性、神学对人学的宰制面前，西方近代的思想革新以复兴古代的文化为旗帜，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

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复苏了人性和人道，推动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人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奠定了今天仍然成为世界普遍价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理性、正义、宽容等等。上述启蒙价值在中国的生根及法制秩序的建构确乎是现代化伟业的基石，而包括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之负面的、糟粕的东西必须扬弃。

然而，正如学者们指出的：欧洲中世纪的文化并不能以“黑暗”二字一言以蔽之，其中仍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兴盛而言，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的意义更为深长；西方人文主义自有其浅薄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东西方有识之士都在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并重新估价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反思西方理念，包括民主、自由等启蒙价值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缺失。例如，讲人权不能不讲责任和义务；法制不能取代一切，更不能与礼乐教化同日而语；讲个性自由必须同时讲群体价值观。吸收各民族自身的政治道德资源和深刻博大的本体论、宇宙观、人生观，解决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人与天、地、人、我之间的疏离病痛，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危机是物化世界观的泛滥，是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人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制品所主宰，人从目的的地位下降为工具。功利化、浅薄化、平庸化、狭隘化、市场化，销蚀、肢解着人性。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完整性日趋丧失，人的潜能的发展被单一的功能性运作所遮

4 /功利与权谋——纵横家的人生智慧

蔽，人与人生存共在的世界及人与天、地、人、物的关系都在恶化。

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需要精神安顿。在21世纪里，人们将生活在日益世界化、一体化的社会中，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日趋追求归乡和故园。人之为人，本来就具有寻求生命意义的意志和力量。当这种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时，或者这种求意义的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时，就引起心灵或精神的失衡，从而需要意义治疗。意义治疗的东西是很多的。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我之间相互和谐的资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今天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都有一个消化和重新拥有我们的传统的任务。我们要摒弃封建专制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三纲”，转化吸收“五伦”的合理内容，使它变成在尊重个人自由、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道义原则基础上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和亲友伦序关系，纳入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之中。仁爱、忠恕、孝悌、信义、笃实、敬业、宽容、诚信无欺、谦虚礼让、克己奉公、修己慎独、与人为善、勤俭廉洁、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仍然是我们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更是我们各级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基本尺度。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做人之道，体悟生活的意义世界，使我们意识到生活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此安身立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头等重要的。

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它重视人的生命中所蕴藏

的追求理想的动力，自觉反省、超升，以成就生命的最高价值。它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把知识与权力放在工具的层次。它是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它蕴含了宗教、道德、艺术、教育、哲学等方方面面，从不同层次上发展、丰富自身。这一精神在几千年里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源泉，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和。这一精神促使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并十分重视教育，沟通理想与现实，以人文化成社会，自强不息，积极进取。

中国人文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即不是面对并征服自然的，而是亲和自然，面对社会和个体自身的。这种人文主义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强调天、地、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各安其位，雍容洽化的。这种人文主义根植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和上帝的信仰，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不排斥宗教，而具有某种宗教性，因此能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之特点是内在与超越、自然与文化、道德与宗教的和合，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和终极理想。

中国人文精神落实在人生态度上，它所讲述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扬的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仍有开发之必要。其重视教育，特别是重人文教育的特色和有深度的人生智慧，可以为现代化服务。

人们不管如何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各种活动，总需要一种终极的信念、信仰的支撑，这是任何金钱或权力拜物教

6 /功利与权谋——纵横家的人生智慧

无法取代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总需要有深度的开悟，超越自我，超越生死，得到自在的体验。这样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担一切的挑战与痛苦，获得心灵的安顿。有了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的精神，并且转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质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者都应当具有一定的信念与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中国的道家虽暂时遗世独立，对儒家作补充与调节，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入世的，中国的佛家也把出世与入世结合了起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以成至人真人，人人皆可以成佛，实际上是儒、道、释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而要造成一个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必须造成人们理想的高尚的内心世界。它们尽管有很多差异，然其共同点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使人们的人生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人们有不同的世间关怀、世间肯定，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其“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献身热忱，虔诚无欺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重新体验儒释道及其它各家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它作为当代社会生活参与者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我国现代化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重建，再建崇高，再建理想人格，是我们迈进新的世纪的重大课题。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工商社会，人们比较强调多方面的

总序\ 7

社会参与,强调人权、公民权利与义务,然而在人文淡泊、道德危机、工业化商业化的负面日益显露的当今,单面或平面化的参与,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的膨胀,已无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无法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地发展,无法治疗人的异化和诸多的社会病。无论就社会的完美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在 21 世纪将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传统的人文精神。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瑰宝,找生命力。

1998 年 2 月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文化学院副院长)

目 录

1	总 序
1	纵横家与纵横家的智慧
12	功名利禄
19	人的处境如“妾”
26	趋利避害
32	穷则思变
40	不屈不挠
47	尚智唯用
53	礼贤下士
61	自我推销术
68	审时度势
74	投其所好
81	威胁恫吓
87	嫁祸陷害

93	杵合离间术
99	诱骗欺诈术
105	环转迂回术
111	事贵制人
118	坐收渔人之利
125	王道与霸道并用
132	求助的艺术
139	设防的艺术
146	重游说轻武力
152	游说之难
160	游说贵在“得情”
166	揣测以得情
173	摩意以得情
180	游说的方法(一)
186	游说的方法(二)
192	后记

纵横家与纵横家的智慧

在我国现代的哲学史教科书中，一般找不到纵横家三个字。在94年出版的《中国春秋战国思想史》中，我所能找到的有关纵横家的论述，只有这么一句话：“纵横家朝秦暮楚，颇能兴风作浪，但是就其学术而言，实在谈不上，远不如兵家。”大概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能找到少许有关纵横家活动的记载。这些似乎意味着这么一点：仿佛纵横家在哲学史上毫无建树，在思想史上没有贡献，如果历史不是要求忠实地记载史实的话，恐怕即使在历史教科书中也找不到纵横家的影子了。这足以说明纵横家对现代人来说，有多么的陌生，多么的不足为人道。

然而，事实上纵横家在战国至秦汉之际是一群名声显赫的政治人物，纵横学说也是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给纵横家的关注是很多的，给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让他们所占的份量也是很重的。在给历史人物立传时，除了孔子和他的弟子是单独立传的以外，许多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人物都是合传的，如老子与韩非子合传，孟子与荀子合传，而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却都是单独立传的。而且就所立传人物的数量而言，除了儒家外，大概就数纵横家多了，大大超过了对后世很有影响的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兵家。所涉及的人物除了苏秦、张仪外，还有樗里疾、甘茂、范雎、蔡泽、陈轸、鲁仲连、邹阳、主父偃、

鄙食其、蒯通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纵横家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大家。

纵横家三个字虽然为现代人所陌生，张仪、苏秦的名字也远不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名字那样为后人所家喻户晓，但纵横家在游说中流传的许多故事，却为一般老百姓所熟知。如“头悬梁锥刺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亡羊补牢”、“门庭若市”、“南辕北辙”、“狡兔三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毁树容易、种树难”等等，这些典故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大概就由他们的父母或老师告诉他们，人们虽然不一定知道这些典故大多出自纵横家之口，但这些故事本身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给人们很多的启迪。

纵横家的产生和演变

纵横家即是从事合纵和连横活动的人，其中“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蠹》）即联合弱小的国家抵御强国的进攻则为合纵，而依附一强国去进攻其它弱小的国家则为连横。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相互间明争暗斗，在政治和外交上，时而采取合纵策略，时而采取连横策略，纵横家也就在此基础之上应运而生。

至于纵横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中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它的概括：“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也就是说，纵横家最初是由“行人之官”发展而来的。“行人之官”在周朝时就已经出现，其时，还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之分。据《周礼·秋官》中记载：“大行人掌管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

亲诸侯。”可见“大行人”是掌握周王朝一切外事活动，接应诸侯及四夷进朝，并负责督教各邦交国外交礼仪的官吏，是王朝外事礼仪的总负责人。“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可见“小行人”是执掌具体的接待事务的官吏。到了春秋时期，行人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不但负责接待迎送等职，而且还可以出使作为他们的职责，这时的行人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外交官。而那时的行人必须具有“明辩说，善辞令”的特长。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魏、韩、赵、楚、燕、齐六国的兴盛，各国都致力于加强军队、兼并敌人，所以谋诈的主张被采用，而纵横家关于政治短长的学说由此兴起”，这是《史记·六国年表》中对纵横家兴起的描述，应该说揭示出了纵横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战国时期，由于统一的周王朝的衰落，七国的出现，各国或为自保，或为图霸，相互间的竞争和倾轧十分激烈，导致各国都愈来愈依赖武力，依赖谋略，而轻视仁政，于是纵横术流行，纵横家被重用。

合纵活动萌芽于魏惠王为抵御秦的骚扰而发动的逢泽之会，目的是借他国之力以御秦，结果被商鞅施以离间计，挑起齐、楚对魏惠王“行王服”的讨伐，使合纵御秦失败。连横活动则萌芽于魏惠王策划的“徐州相王”活动，目的是挑动齐、楚的矛盾，借强楚之力来抑制另一强国齐国的发展。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连横活动是张仪入魏，说动魏惠王“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挑动起关东诸侯间相互的争斗，为秦蚕食六国奠定了基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纵活

动,是由陈轸说动,公孙衍发起的“五国相王”活动,这是关东诸侯合纵抗秦的开始,但不久合纵攻秦宣告失败。

以后合纵连横活动得到不断地发展,而合纵连横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而又针锋相对的两种策略。在一些国家中,时而合纵派占据着主导地位,时而连横派成为主要力量。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苏秦策划的六国合纵攻秦等活动。

秦统一中国以后,纵横家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他们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也就逐渐的衰落和消失,大多数纵横术士都销声匿迹了。

秦帝国覆亡,楚汉逐鹿中原,纵横家又开始活跃起来。其中郦食其颇有战国策士的余风,陆贾也有某种纵横家的味道,而影响比较大的,在楚汉相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则算是蒯通了。蒯通所做的第一件比较有影响的事,就是在郦食其已经劝说齐王田广降汉的情况下,劝说韩信继续进军攻打齐国。韩信为蒯通说动,大举攻齐,齐王田广误以为郦食其的游说是一个大骗局,一怒之下,竟把郦食其烹了。第二件比较有名的事,则是蒯通从“兔死狗烹”的角度,力劝韩信背叛刘邦,自立山头,形成楚、汉、齐三足鼎立的局面。结果韩信念及刘邦对自己的恩情,又仗着自己有功,而没有采纳蒯通的建议。蒯通失望之余,“佯狂为巫”以求避祸。韩信只是在被斩三族时,才后悔没有采纳蒯通的建议。

汉朝建立后,纵横家已经基本上是走投无路了,当时学有长短纵横术的主父偃已经懂得逐步的向儒家靠拢。他向汉武帝上书,主张实行“推恩术”,很得汉武帝的赏识。与主

父偃同时的徐乐以“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思想；严安则以“秦贵为天下，拥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的思想，俱为汉武帝所赏识，汉武帝曾有“相见恨晚”的感叹，并将他们官封郎中之职。在这里，无论是主父偃，还是徐乐、严安，他们虽还都有纵横家的辩才和智慧，但他们的“推恩术”、“土崩瓦解”、“穷兵黩武”等思想都已经向着儒家的仁政思想靠拢了。在他们之后，纵横家作为一个学派基本上就已经绝迹了。

纵横家的特征和主要代表人物

纵横家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功名利禄对他们有着特殊的诱惑力。从《史记》各位纵横家的传记中，我们知道：苏秦生于平民之家，早年四处游说，“大困而归”，受尽了父母、妻嫂的冷落与难堪；张仪则是没落贵族的后裔，早年也贫困潦倒，曾被人疑为偷玉之人；甘茂出身下蔡民间；虞卿则是穿着草鞋，打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的；范雎因为贫穷，无法自助，曾做别人随从以度日；蔡泽早年因贫困，而找唐举看相，希望能时来运转，不料反被唐举讪笑了一番；酈食其家境贫穷落泊，只好做个看管里门的小吏。可见大多的纵横家都是贫苦出身，但他们又都往往不甘于贫苦，因此，获取功名利禄，以摆脱贫制约他们的贫穷困苦，是他们人生的一大动力。苏秦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誓要获取卿相富贵之位；范雎遭人忌嫉，被打得半死，受到被人轮流把小便拉在身上的耻辱，还能忍辱偷生；甘茂遭人陷害，离秦去齐时，甘愿做人仆人，以求东山再起。这些都足以说明，为着生